

〈调查研究シリーズ 110〉

从普及视角看近代中国语言辞书

李 珊

一、书前

中国文献记载的历史源流久远，其文字流传更具独立体系，但是在 19 世纪以前的各个时代，能读书识字的人很少，即使是到 20 世纪初期也不到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广大的民众对于自己民族的方块字是享受不到学习和认识的机会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不以提高民族学习识字为己任，相反，他们控制生产力发展，让读书识字仅变成踏入封建庙堂的敲门砖。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缘故，就是汉字的复杂结构与多重演化，使许多学习者望之却步。以字为本位的汉字，仅在 2 千多年以前被秦始皇帝规定“书同文”以外，却一直没有规范“字同形”、“字同音”“字同义”。清代 3 百年，训诂学相当热门，对于汉字的字形、字音多所研究，而对于字义的研究相对薄弱，留下后遗症。

早在周朝，中国就有字书出现，给学习者开始提供解释，但多已失传。汉朝出现的《说文解字》《尔雅》两部辞书，成为中国字典、辞典的先河。能够荟萃十八世纪以前中文字的最大成绩，就是 1716 年以皇帝命名的《康熙字典》成书。全书收录 47035 个字，分 214 个部首，以韵书的反切来注音，先注本音本义，再注异音异义，由引伸以及通假等。虽然曾被吹嘘成：“无一义之不详，无一言之不备；信乎六书之渊海，七音之准绳也。”¹⁾ 只是其中差错颇多，在清代就曾引来批评与纠错，其实用价值并不高。

而当西方文化开始涌入东方，西方人想了解中国的第一道屏障，就是汉字。于是他们自然利用西方传统拼音文字来力图对应中文。早在明朝的 1626 年，法国人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 在杭州著《西儒耳目资》出版，该书是用罗马字拼音方案来拼汉字音，取代反切方法。该方法获得当时中国人的认可。接着拖到近两百年后的 1815 年，英国人马礼逊 (R. Morrison, 1782-1834) 在澳门编辑与《康熙字典》同名的《字典》出版，该书体例完全与《康熙字典》排列相同，但将其中反切改为英文拼音，将内容改为当时中国南方书生常用的通俗的解释；接着他还在 1822 年编辑出版《英华字典》。这样，他就搭建了中文与英文双方沟通的文化桥梁。40 年后，德国人罗存德 (W. Lobscheid, 1822-1893) 在香港编辑《英华字典》出版，则更是大规模扩大中文与

1) 《康熙字典》序。武英殿版，线装 40 册，1644 年一版，书海出版社，2003 年 11 月影印本。

英文的对应内容,让双方学习者都能够方便学习对方。但可惜的是,这两部辞书仅给予许多西方人学习中文的方便,连当时日本人也利用来学习,而中国人长时间没有注意到这两座巨大的文化桥梁,错过机遇。

直到近代中国在国际问题上遭遇一连串失败后,才有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愈加高涨。其中重要的一项历史重任,就是对中文进行全面整理与规范,以适应现代化的需求。所谓全面规范,就是包括汉字的国音运动、国语运动、简繁体字协调、新语法新修辞学形成、新辞书出现、新词语的接纳等等方面;所谓现代化,就包括中文与外国文与的互相认同及翻译,以及国内语言文化的普及问题。本文仅是从普及视角,介绍中文新辞书在其中的历史成绩和作用。其他留待以后再述。

二、国音字典之产生与国音之普及

中国古代有“国音”这个词,却没有中国字音的标准规范,只有几个官话区,以及各地方言区,互相之间交谈并不方便。自然早年来华人士更加不方便,到19世纪中叶,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用中国各地方言翻译《圣经》十余种,更有英国驻中国大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在1867年编辑出版《语言自述集》,深刻地揭示汉语的内在机制和语法特征,对北京官话做出初步规范。这就给予中国书生们极大鼓励,希望给汉字加上注音拐棍或者是拼音文字。第一位创造新拼音方案的卢懋章先生(1854-1928),在1892年著《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他在序中写道:“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窃谓国之富强,基于格致。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其实一能好学识理者,基于切音为字。则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基于字话一律,则读于口遂即达于心。又基于字画简易,则易于习认。亦即易于捉笔,省费十余载之光阴。将此光阴专攻于算学、格致、化学、以及种种之实学,何患国不富强也哉。……”²⁾卢先生开始就将文字的拼音方案与富国联系在一起,同时他还希望能够起到统一正音的效果。早年的中国改革者也多关心此事,如梁启超就写道:“中国以文明号于五洲,而百人中识字者不及20人。虽曰学校未昌,亦何遽悬绝如是乎?吾乡黄君公度之言曰:‘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中国文字多有一字而兼数音,则审音也难;有一音而具数字,则择字也难;有一字而具数十撇画,则识字也又难。’(《日本国志》三十三)呜呼,民华识字之希,毋亦以此乎?梁启超曰:天下之事理二:一曰质;二曰文。文者美观而不适用;质者适用而不美观。中国文字畸于形,宜于通人博士,笺注词章,文家言也;外国文字畸于声,宜于妇人孺子,日用饮食,

2) 卢懋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序。1892年,转引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编,1958年9月一版,第1-2页。

质家言也。……盖文言相离之为害，起于秦汉以后，去古愈久，相离愈远，学文愈难，非自古而即然也。……”³⁾另一位先行者吴稚晖先生则写道：“文字者，当一见而别即显，又一见而其音可诵。果如此，则为完全之文字。切音国之字典、词典也；吾人之字典，则音典。……中国文字，本统一也。而语言则必有一种适宜之音字，附属于旧有之文字以为用。于是声音亦不得不齐一，……”⁴⁾等等，很是理智且警醒。

所后十余年间，蜂拥而来多种“新切音”方案，引发上层注意与讨论。例如北洋大臣袁世凯在1903年飭直隶学校司妥拟推行办法，他写道：“国民普及教育，必由语文一致，而成为东西各国之通例。该学生等所呈《官话合声字母》及切合音之法，与吾国古时文字单简假借同音之例，初不相背，果能通行无阻。……必先引其端倪而后可收成效。……”⁵⁾其结果是中文拼音字母开始陆续进入北方的一些学堂，成为教材，取得较好的效果。1910年，资政院开会，严复作特任股局长审查，他说道：“吾国难治之原因有二：教育不普及也；国语不统一也。而皆以不用官话拼音文字之故。……谋普及教育，统一国语，则不得不亟图国语教育。谋国语教育，则不得不添造音标字母。……简字当改名音标，……一以示为形字补助正音之用；一以示拼音性质，与六书形字之殊。……用法有二：一范正汉字读音；二拼合国语。汉文读音，各方互异。范正之法，于初等小学课本每课生字旁注音标。……”⁶⁾于是接着在1911年6月开“中央教育会议”，会长张謇、副会长张元济、傅增湘，与会者196名，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算是官方同意了。“办法”中写道：“一 审定音声话之标准 各方发音至歧，宜以京音为主。京语四声中入声，未能明确，亟应订正，宜以不废入声为主。话须正当雅驯，合乎名学宜以官话为主。一定音标 音标之要则有五：一，音韵须准须备。二，拼音法须合公例。三，字画须简。四，形式须美。五，书写须便。无论新造征旧，必以兼合此要则者，方能使用。又须兼备行楷两种。该音标订正后，先在各省府厅州县酌定期限，试行传授。……”⁷⁾

到1913年2月15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国音统一会筹备会”会议，会长吴稚晖，副会长王照，与会会员80人，每天按照吴会长设定的民主程序，唱念单字，再由各地代表讨论并举手表决通过，共进行到5月22日闭幕。会上完成四项题案：1、审定国音2、归纳韵母3、采定字母4、议决国音推行办法。其中就决定了第一次的国音的24个声母，12个韵母，3个介母，及写法等，共审定6500多字单“读音”；还要求各省设立“国音字母传习所”；速备“国音留声机”；中等师范及小学教员，必须以“国音”

3) 梁启超：“沈氏音书序”，原载《时务报》1896年11月，转引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同(2)，第7-8页。

4) 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1909年6月26日，载《吴稚晖学术论著》，梁冰弦编，出版合作社，1925年11月一版，1926年1月再版，第281-302页。

5) 袁世凯批语。转引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同(2)，第40页。

6) 严复报告。转引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同(2)，第134-135页。

7) 中央教育会议统一国语办法案，转引自《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同(2)，第143-144页。

教授；小学课本在汉字旁添注“国音”；公告通知等，一律添注“国音”等。以后 20 余年间，又陆续经过四次大修订，中国的国音就这样被唱出来了。

当年，王璞先生就将这 6500 多字，按照同音字汇编，每字再分五声，编辑成《国音检字》出版，但不能检索字形、字音、字义，使用不便。《国音字典》的出现，就要等到 1918 年，吴稚晖先生自己将已经选定的 6500 多字外，又增加 6000 余字，及科学新字、俚俗字等，共约 13000 字，到北京邀请几位专家审定讨论同意，并经过教育总长傅增湘同意，交由商务印书馆，名为《国音字典》在 1919 年 9 月出版。书前长篇例言，是以教育总长傅增湘名义发表，其中写道：“此字母为改良旧日之反切而作，用以标注汉字之读音，故曰注音字母。本书所注之音，为全国共同遵用之标准音，故曰国音。注音字母为标注国音之用，亦可名曰国音字母。”⁸⁾ 其条目例如：

“且 (一)ㄑ一ㄝ 清齐上马。如且夫。苟且。(二)ㄖㄩ 精撮平鱼。如只且。次且。(三)ㄑㄩ 准清撮上语。敬也。(四)ㄖㄨ 准徂。平虞。义同徂。”⁹⁾

到 1932 年，教育部又通过第二式“国语罗马字”，遂又两式并列编印《国音常用字汇》。其条目例如：

“阴平 [ㄩㄢ iuan] 鸳 智 宛 (大宛，西域国名) 鹈 渊 冤 冤 鸢 娟
阳平 [ㄩㄢˊ yuan] 元 沅 鼋 荒 垣 洹 (又读) 原 源 嫫 螭 蛭 驷 员 陨 (幅陨，
通员) 圆 圜 袁 猿 媛 媛 园 园 辕 爰 援 媛 媛 缘 椽 蜎”¹⁰⁾

就是这样把中国从来没有的两种国音拼音符号与中国传统字互相对应形成的字典，迅速地在中国年轻人之间学习并蔓延，也就让这些学习的师生成为时代的生力军。几十年间，以国音名义出版的字典有 40 余部，还多次再版。其中的出版社，是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首，其他也多是在北京、上海印刷出版。商务的主编有方毅等人，中华的主编有陆衣言等人。其他书编者中不乏著名书生，如黎锦熙主编的《国音字典》；赵元任正音的《国际音标国语正音字典》；刘复编的《标准国音中小字典》；王璞编的《王璞的国音示范》；谭正璧编的《小学生模范字典》；不见经传的编者如北平前圆恩寺小学编辑字典委员会编辑的《标准国音常用字典》；另外还有陆衣言编的《中华国音留声机片说明书》等等。

那个时期的国音推广是全方位的，上有国家支持，各省具体办，学术有学者把关说明，有专门报刊宣传，有电台广播，更有下乡义务教育等等，社会热情也高，推广是成功的，但是效果却是模糊的，也可以说是混乱的，问题出在国音方案本身的先天不足，

8) 傅增湘：“《国音字典》例言”。教育部读音统一会编纂，商务印书馆，1919年9月一版，1920年1月四版。

9) 同(8)，子编第1页。

10) 《国音常用字汇》。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编，商务印书馆，1932年5月一版，1933年6月三版，第265页。

欠缺太多，而且尚且没有完善解决的新办法，也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评论。1949年，唐兰教授就曾明确指出：“友人批评注音字母是退步的，因为劳乃宣的简字是用作民众教育的一种新文字，而注音字母只是汉字旁边的附属物。……只是一种工具，工具是可学可不学的。那就无怪推行了三四十年，没有很大的效果。……民国二十三年跟着大众语而来的拉丁化新文字，是一种简单的粗糙度拼音文字，没有四声，所以应用是很不方便，（孔子可以读成空子，）它们虽然用来写方言，却不能和任何一种方言符合，虽然曾经热闹过一阵，现在似乎已无人提起了。……注音汉字却是道地的，可是十分愚笨的，旧调重弹的注音文字。由此，可见一般人的保守性。在我们觉得中国文字太难认的时候，就主张文字应该改革的，可是到了实际要改革时，却畏葸了，退缩了。我们如其想一想中国文字的声符，从来就不固定，……我们为什么不在改革文字时，因利乘便，把旧的不容易认识的声符换掉了呢？为什么不改革文字而只想统一读音，不创造新文字而只做认识文字的一种工具，注音符号呢？……我总是觉得推翻汉字不如改革汉字。……我们也明知道，合理的未必能行得通，通行的未必合理。但是，钱先生墓草久宿，黎先生也垂垂将老，这种屋上架屋，床上叠床的注音汉字，累赘不适于用的注音符号，我们能坐视它延长下去，永远是过渡时期吗？合理的改革，正是我们的责任。”¹¹⁾

三、国语运动

国语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变革中的主线，它涵盖着那个时代的语与文、字和音、白话与文言、大众语、标准语、简体字与繁体字、文法句法语法，等等，由于时代进步的要求而引发的争论和行动。其根源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中国言语……往往文字可达之意，言语不得而传。是则中国人非不善为文，而拙于用语者也。亦惟文字可传久远，故古人所作，模仿匪难。至于言语，非无杰出之士妙于修辞，而流风余韵，无所寄托，随时代而俱湮，故学者无所继承。然则文字有进化，而言语转见退步者，非无故矣。……中国自古以来无文法文理之学。为文者穷年揣摩，久而忽通，暗合于文法则有之；能自解析文章，穷其字句之所当然，与用此字句之所以然者，未之见也。……夫有文法以规正言语，使全国习为普通知识，则由言语以知文法，由文法而进窥古人之文章，则升堂入室，有如反掌，而言文一致，亦可由此而恢复也。……”¹²⁾

于是在近代中国，由于一代书生们的鼓噪，互相争辩，逐渐形成全民的国语运动，对于大量国语的字形、字音、字义、组词、标点及文法等，进行七嘴八舌地全面审理，形成实践协调的高潮。其领头人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头人胡适与陈独秀。胡适博士

11) 唐兰著：《中国文字学》，开明书店，1949年3月一版，第188-192页。

12) 孙中山著：《孙文学说》。刊于1919年，转引自《中山全集》第三册，上海光华图书公司，无出版年，第三章第21-23页。

在1917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不主义”——“一、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二、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三、不用典。四、不用套语烂词。五、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六、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八、不避俗语俗字。”他接着是四条要求：“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¹³⁾他的要求至今依然有效。陈独秀教授写“文学革命论”来大力声援，他写道：“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沉浮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¹⁴⁾各路书生接着就在书刊讲坛广播上，层出不穷地百家争鸣了。这里仅选很少部分略述：

（一）白话与文言

白话与文言本来在古汉语里各自运用，互不冲突。只是由于近代的时代要求，新思想只有用新语言来表述才清晰恰当，新文体的出现才能够满足新书生的需求，白话就成为一种新方式新方法，即使那些打好旧学底子的年轻一代书生也都能应用如流。当然，这也就是学习到西方处理语言的新方法。白话不单有在大众流传中的优势，关键在于其所表达的语义、句义上清晰准确得多。而文言传统则由于要求“字字珠玑”，其事实反倒是让读者云山雾沼，极易领会错作者意思。

当时白话的表述方式多种多样，早在1898年，裘廷梁就创办《无锡白话报》；接着在1906年京师也有《正宗爱国报》和《暮鼓晨钟》等；1904年有《最新妇孺唱歌书》等白话书；进入民国，热闹中连作诗、尺牍都大量用白话写了，就更不用提大量的文学作品了。就连反对白话文的林纾先生，自己出的书中的述义，也白话化了。至于那些新国学大师，也用上新方法及新史料，使得国学研究、文言文研究教学，也使用白话方式。很明显，文白之间没有什么你死我活的矛盾，倒是通过当时的论争，中国书生和民众都获得新知，一方面创造了新的文化产品，一方面挖掘了传统文化的精华，扬弃了陋习糟粕。文白之争，功不可没。

（二）简体字与繁体字

汉字古代只有别体字、俗字、破体字、异体字、正字、简字等区分字体用词，没有“繁体字”“简体字”这样的区分。20世纪初期“繁体字”成为新词出现，代表的却是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成果。本来，任何一个民族都会在漫长岁月中自我进行字体、字音、字形、字义的调整或清理，趋同求易是普遍的追求。而古代自从东汉许慎宣布汉字造字

13)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原载《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转引自《新文学评论》王世栋选编，新文化书社，第54-55页。

14)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原载《新青年》2卷6号，1917年，转引自同(13)，第49页。

只有六法：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形声、假借以来，虽然象形字在其中不到百分之几，但事实上的汉字造字却反倒混乱了，正如1926年的国语筹备会上宣布：“……我们民族真是大大的不幸！不由‘象物’（即象形）‘象事’（即指事）进而走‘象声’（即拼音）的顺路，乃被鬼挡墙，盘旋不进，牵强‘形声’妄为拼合，竟弄得形既不象，声亦不谐，夹七杂八，不三不四；至所谓‘比类合谊，以见指撝’的‘会意’办法，捕风捉影，胡拉乱扯，那更无聊已极，幼稚可笑了。造字之法，既已铸成大错，至于‘转注’‘假借’的用字方法，所谓‘建类一首’和‘依声托事’也者，也不过是走入牛犄角胡同以后的撞墙办法罢了。假使早经觉悟，此路不通，抹过头来，用了拼音文字，则那些单音之字，只统摄于几个声音之下，便用不着‘同声相假’，也不必‘展转互训’，再不像那‘初哉……始也’‘皇王……君也’的麻烦了。那单音字自然不会‘孳乳渐多’得奇形怪状的没人认识；複音词尽量发达，然也绝不会像‘委蛇’‘蜿蜒’同‘科斗’‘疙瘩’那样，一个语根会翻出几十个不同的写法来的。从前只管削足适履的强言就字，生把活泼流利的福音语词，弄得呆滞死板，毫无生气。……”¹⁵⁾

目前已知最古老的汉字是甲骨文，其上面的字就已经有繁简不同的版本，简体字的运用一直存在，延续至今。到近代成为简体字运动，最早正式提出，应该是陆费逵先生，他在1909年的《教育杂志》创刊号上发文：“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到了1922年，钱玄同教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提出议案：“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他写道：“外面有些人反对减省汉字笔画的办法，有的说汉字是‘象形文字’，有的说汉字是‘衍形文字’；既是‘象形’或‘衍形’，则古人造字，字形之中具有精意，不能随便将它减省。这种议论是没有道理的。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笔画多大，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当然是适用。我们应该谋现在的适用不适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¹⁶⁾获得教育界同仁好评。到1935年，教育部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总共有324个字，鼓励大家使用。这些简体字其实是已经在社会上流通的，其目的在于方便书写，成为写字的主要教材，而一字两体，中国人同样要认识，并非取代繁体字。

（三）标点符号

中文古书上缺乏系统的标点符号，只有一些句豆符号、音调符号、校勘符号。如在明朝《永乐大典》上，也仅是用一个小圆圈，盖在每一句之间，当点断之用。到清朝《康熙字典》上，则连这一个小圈也去掉。只是当西方来华人士著译中文书籍时候，他们很自然就把西方的标点符号用上去，中国书生则很晚才注意到，王炳耀先生在1897年才提出10种中文标点符号，也很少人关注。直到1916年胡适教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

15) 国语筹备会文，见《中国文字改革文集》，白占友编，天津南洋书店，1934年11月一版，第102-105页。

16) 钱玄同提案，转引自黎锦熙著：《建设的‘大众语’文学》，中国大辞典编纂处，1934年10月一版，第20-26页。

“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一文，作出系统分析。1918年陈望道教授亦著文：“标点之革新”。到1919年11月，胡适等六人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上提案：“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获得修正通过，在1920年被教育部颁行。

（四）国语

“国语”的内涵，吴稚晖先生曾给出一个通俗的解释，即是把国音、国字、国文三者包括进来，就算是国语的内涵。而魏建功教授则曾给出更全面的表述：“1、声音表现意思——形成语言；

2、图形表现意思——形成语言；

3、动作表现意思——形成语言或文字；

4、语言与文章表现意思——形成文学；

5、民族共同所有的表现意思的声音是国音；

6、民族共同所有的表现意思的图形是国字；

7、民族共同所有的表现意思的编录是国文；

8、用国音读出来国字写出来的国文就是国语，最精采的成为文学；

9、国语有时间空间的不同，因为如此标准也有些变迁，就成为国音沿革、国字源流、古今文体及文学史。”¹⁷⁾

而国语在中国近代的实践是十分丰富热闹，既至中小学国语教育上全面运用，全面提高新一代人的语言文化知识，更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推广运用，全民族的语言文化焕然一新，也产生大量丰富的精彩的新语言文化作品，更推进中国语言文字的新研究。

四、辞典的涌现

传统汉文化是以“字”来作为基本表述单位。古代字书就基本能够反映汉字的特征，到《康熙字典》的出现，就已经可谓汉字集大成了。只是由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世界潮流，用单个古字去表述新事物，显然既不恰当，也根本追不上需求，于是，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仿效联绵字的方法，把原先并不联绵的两个字，全都根据需要的语义而联到一起，组成一个“词（辞）”，这自然就包括西方翻译来的词和日本翻译来的词，再把联绵字也称作词。其结果，在近代中国就一下子涌现极大量的新词，运用新词成为中国人的普遍视角。这些新词自然需要社会的公允性判断，经历过读者洗礼，才可能生存。于是就需要一种新型工具书来规范表述，而新一代的出版家、编辑们都愿意做出贡献来规范词形、词义，聚成辞典，读者们更是很欢迎，这就是20世纪前半阙突然冒出百余部中文辞典的缘故。

17) 魏建功：“国语运动书端”，转引自《魏建功语言学论文集》，商务印书馆，2012年北京一版，第322-323页。

中国古代虽然辞典比较少,但日本在近代却编纂大量新辞典,康有为先生就曾通过《日本书目志》,介绍给中国人。到1911年以前,中国人已经署名翻译日本辞典11部,未署名利用日本辞典编译5部,包括《新尔雅》、《东中大辞典》、《日本法政辞解》、《博物大辞典》等。这些辞典给予中国人一定的帮助。

近代中国学者编纂的辞典代表,应该是东吴大学黄摩西教授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在1911年出版,该书共有11865条目,约60万字,包含63门专业知识,检索系统明白,附有外文对译。更重要的是,条目的概念性撰述,相当清新且明白,有自己独立见解,以及极为广阔的近代新知识为主调。该辞典已经完全脱离传统中国字书的结构与语义阐述习惯,而与当时西方一般辞典条目相近。¹⁸⁾

由于近代辞典丰富且全面,本文仅介绍汉语语言为主要内容的辞典,而将社会科学范畴的辞典、自然科学范畴的辞典、双语辞典等留待以后再述。同时,当时出版的各种字典也省略不述。下面分别略述:

(一) 一般语言辞典

以全面清理和普及为主旨的语言辞典在近代是一大热点,几十年间在市场上流传。如此新文化工具,正是以其实用性、公允性、普遍性为特征。中国人总算有了一种大家都能从中获得概念一致的知识,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权位高低,不分宗族派系,大家都有了共同的概念判断标准。并且查询起来相当方便,是非之分,真伪之分,古今之分,一查立判。不管当时社会上出现什么样的奇谈怪论、胡言乱语,只要查一查能够提供词形、词音、词义的辞典条目,就立马明白了。

在当时出版的20余部大小辞典中,各具特色。这里仅简介数部:

商务印书馆同人以陆尔奎等为主编,用8年时光,在1915年编辑出版《辞源》,成就近代中国最权威的工具书。该书收录单字13000个,词组约10万条,部首仍按《康熙字典》的214个。陆先生在“辞源说略”上写道:“辞书以补助知识为职志。凡成一名辞,为知识所应有文字所能达者,皆辞书所当载也。举其出处,释其意义,辨其异同,订其讹谬,凡为检查者所欲知,皆辞书所当详也。供一般社会之用,非徒为文人学士之用,皆辞书也。……普通辞书注释,必以简明为主。然辞有引申假借,有沿革变迁。举甲不能遗乙,有委不能无源。往往一辞而有数义,一义而有数说。且法律名辞、科学名辞,各家著书,率自标定。因范围之广狭,遂生术语之异同。欲调停众说,即难免辞费,至形容实物,并及其性质功用;叙述故事,并及其因革源流。窃谓辞书既以解释疑义,必使阅者疑义尽释,方为尽职。……”¹⁹⁾ 当时有陆先生这样科学的思想,确实给予中国书生创造出理性的公允的辞书;此书其实也是给中文字词的来龙去脉做了全面的清理与诠释。后人受益至今。

18) 黄摩西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5月一版。

19) 陆尔奎等主编:《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年10月一版。

王云五先生在1930年编辑《王云五大辞典》，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最大特点，在于以王云五发明的中文的四角号码检字法，取代传统的214个部首办法，实在是中文的一大发明。另外还在书后附录各种参考表格30种。

朱起凤先生在1934年编辑《辞通》出版。该书有3100余页，共有300万字。该书是选用古籍中大量双音词语，按照水平韵编排，把音同和音近代通假词、义同通用、近形而讹的词语，搜集排列，再加上编者博举例证来说明其用法，很是不易。

中华书局同人以舒新城为首，编辑《辞海》在1936-1937年间分两册出版。黎锦熙教授在序中写道：“整理国故，吸收新知，最系统化的工作，就在编一部大类书；正名辨物，赏奇析疑，最具体化的工作，就是编一部大辞典。……”²⁰⁾该书由词目10万余条，很多新词加进诠释。

汪怡主编《国语辞典》在1937年出版，也收录有十余万字词，并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注音。该书是因刘复教授提出“编纂国语词典案”，而成立的国语词典编纂处，按照黎锦熙教授的序中言：“忽然打算要对于中国文字作一番根本的大改革，因而不能不给四千年来语言文字和他所表现的一切文化学术等等结算一个详密的总帐，以资保障而便因革，则具体化的工作惟在辞典。……”²¹⁾

（二）研究型语言辞典

中文自古至今数千年，长期缺乏系统的清理，近代有了开放的思想，科学的研究手段，自然对于中文各个方面容易进行新的研究；这当然也正是在清朝数百年的训诂学成绩的基础上。在当时出版过十余部研究中文内容状况的辞典，给深入规范汉字、了解汉字来龙去脉，开拓了新的道路。下列简述数部：

国学扶轮社编辑出版《文科大辞典——修辞学之部》，时在清末民初。书中收集大量各种体用词，为治修辞学之材料。

艮思氏著《辞微》在1912年出版，为研究文言文虚字定义、用法及其声调的工具书。孙锦标撰《通俗常言疏证》在1925年出版。该书是将古代俗语常言加以疏证。按主题分类40种。

陈独秀著《字义类例》在1925年出版。该书是作者无法搞政治之后，闲余时对于汉字字义进行十个方面的具体分析。

叶长青著《文字学名词诠释》在1927年出版。该书是对古今文字学用词作出解释。

杨树达撰《词诠》在1928年出版。该书是引用古文书来说明古文虚字虚词。

顾雄藻编《字辨》在1933年出版。该书用意是对于使用汉字的形、音、义方面的各种差错，提出纠正。

20) 舒新城主编：《辞海》。中华书局，1936年12月上册，1937年8月下册一版。

21) 汪怡主编：《国语辞典》。商务印书馆，1937年3月一版。

（三）俗语辞典、成语词典等

俗语、成语、谚语、谜语、密语、格言等，都是中文文化长时间浓缩而成，相当丰富精彩。明清时期就有人注意搜集整理，近代人更以辞典形式将它们展示，共有 20 余部。下列简述数部：

胡韞玉、胡怀琛编《俗语典》在 1922 年出版。书中收集日用名词、成语、俗语等，说明其古文献出处。

琴石山人编《通俗日用稽古录》在 1924 年出版。

吴汉痴主编《切口大词典》在 1924 年出版。收集社会上各种专业内部用语行话。

莊适编纂《国文成语辞典》在 1916 年出版。

史襄哉编《中华谚海》在 1927 年出版。

吴东园等编《尺牍辞典》在 1921 年出版。

文公直编《公文用语大辞典》在 1936 年出版。

五、从普及视角看辞书

近代中国从千年封建桎梏及文盲充斥的时代，短短几十年间，就迈进新时代。其间，新知识的推广就是关键之一。而当时新知识推广的主要手段，都需要通过识字去实现。普及识字就意味着全民学习，克服中文字词中种种历史积累的难题，包括规范其字音、字形、以及字义、词义、句义、语义等。这就不仅是教育系统单一能够完成的，还必需有普及的手段、普及的系统，普及的专家，以能够在全国展开。能够完成如此庞大的工作，除了政治家在报刊上喊叫、教育家在课堂上宣讲、出版商印刷教材外，一定还需要有辞书，作为规范这些新知识的载体，才可能比较长时间流通与一致。通观近代日本的实践，亦是相类。

特别是比较一下政治家的言论，就明白其差异。不管他的言辞多么慷慨激烈，即使他讲到中文必须改革，不论从左、中、右任何角度，他都必然有其政治意图在其中。那么，这也仅是他本人的观念，只可能当时有效，不一定能成为公允的概念。而概念是需要经过社会验证，能够为大众实用认可的。中国近代所涌现的辞典条目，就明确宣示其公允性，那能够成为普及工具就十分自然。反过来看，也正是这些辞典所具备的新文化特点，才受到中国各方面民众的追求，才得以畅通流行，历久不衰。

这些辞书的另一个成功的特点，就在于其无形间的规范作用，这在全民普及中必不可少。打开当时辞典中的一部，就在学习其中新的部首分类后，检索自己所需要的字词；接着显示每一个字词的读音，及其写法，然后有清晰公允的词义，也可能加有字词的出处，以及使用的例句。这样，不同观念的人也都得协调在同一的文化思想上，也就是有了一个全国都运用的参照标志。中国近代辞典之功在于全民族升华了知识层面，是现代化中成功的一步。还有就是这几百部辞书的编撰者们，他们能够吸纳西方新辞书的思想

世故。「那个人很世故。」。做事圆通叫世故。”²⁵⁾

(5)《外来语词典》胡行之编 上海天马书店 1936年一版。

胡先生注意到外来语在近代中国之强大生命力,特为之搜集编纂解释,相当不易。条目如:

“【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Ideology of Petit-bourgeois (社)

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即是一方提倡民主主义,而一方又主张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他们的意识可以倾向于资产阶级,而又可加入于无产阶级,游移不定,没有固定的阶级意识。所以有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人,亦称‘游移分子’。”

“【三昧】(宗)

又名‘三摩提(地)’,‘三摩帝’、‘等持’、‘等念’。谓心定于一处而不动。住缘一境,离诸邪乱。后人妄解为‘心得’之义,如谓得茶味,即说得茶之三昧;善于简牍,即谓得简牍三昧,实失本义。”²⁶⁾

六、小结

近代中国,随着时代的大变革,其表徵文化的新辞书大量涌现,给予中国民众知识的大普及。在1949年以前,就编辑出版各类汉语辞书4百部,汉语语言类就近一半,并多次重印发行。

国音字典的产生与国音的普及,是其中很特别一种形式。中国古代仅有书同文,却没有全国统一的字同音。但自清末提出新切音方案,1913年审定“国音”方案,教育部出版《国音字典》。这些字典是在全国中小学中规定学习推广的,统一字母发声、写法及字义,给1万3千多个汉字加上了拐棍,成为新文化的基础。

在孙中山先生的倡导下,随着国语运动全面展开,通过各种形式展开了大量的讨论,对汉语各方面进行了科学的审理,提出改进方案,并在社会实践中进行验证。显然,字典这种传统工具书已经不敷应用,于是出现了与西方相类的辞典。其中普及运用的字典、辞典共约百部,还有专门辞典40余部。这些新辞典,其结构是新分类部首、新概念条目,新字音,大量吸取了西方新知识,规范了传统知识,其实用性达到了空前的高度。

中国近代涌现的数百部辞书,成为中国文化进步的一种标志。中文辞书在中国民众之间的启蒙作用相当成功。

[謝辞] 本稿の作成に際して、熊本学園大学附属海外事情研究所の平成25年度海外調査助成金の援助を受けました。この場を借りて感謝の意を深く表します。

25) 方宾观编:《标准国音白话词典》,商务印书馆,1924年3月一版,1940年8月七版,第63页,第64页。

26) 胡行之编:《外来语词典》,上海天马书店,1936年4月一版,第21页。

普及の視点から近代中国の中国語の辞書を考察する

Li Shan

近代中国では時代の大変革に伴い、その時代の文化を象徴する辞書が大量に出現し、中国民衆の知識を広めるのに大きく寄与した。この史実は明治時代に日本で辞書が大量に出現したのと非常に似通っている。清朝の『康熙字典』は27035の字、214の部首を詳細に整理し、反切によって発音を表示する方法を取った。しかし民衆の識字率が極めて低かったため、近代の大変革には対応し難く、そこで近代的辞書を出版することが時代の要求となり、1949年以前、各種の漢語辞書の編集出版は四百部にのぼったが、その半数近くを漢語の言語音に関するものが占め、しかも幾度も再版発行された。

国音（国家の制定した漢語の標準音）字典が作られ普及したことは、その中でもとりわけ目を引く事例である。中国の古代にあっては、書物が文字を共用することだけがあって、全国で統一され字が（同一の）音を共用す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しかし清末には新たな切音の方式が提案され、1913年には「国音」の方式が審査決定され、教育部が『国音字典』を出版した。これらの字典は、全国の小中学校で学習、普及することとされ、字母の発音、作文の方法及び字義を統一し、1万3000字にふりがなを振り、新文化の基礎となった。

次いで、孫中山（孫文）先生の提唱で国語運動が全面的に繰り上げられた。この運動の内容は近代的な語と文、字と音、白話と文語文、標準語、簡体字と繁体字、句読点、語法など各方面を含み、各種の形式による活発な討論が展開され、漢語の各方面について科学的な審理を行い、改善の構想を提案し、また社会的実践の中で検証を行った。明らかに、字典といった伝統的辞書ではすでに応用には不十分で、そこで欧米の物に類似した辞典が出現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その内、言語の運用を普及させる字典、辞典は併せて百部あまりで、さらに専門的な辞典は40部あまりあった。これらの新辞典では、その構成は新分類の部首、新しい概念の見出し、新しい字音から成り、大量に欧米の新知識を吸収し、伝統的な知識を正し、その実用性は空前の高いレベルに達した。

中国の国語教育と中国の言語文化は大量な辞書の出現及びその規範的な運用、知識面の普及により全面的に高い水準を実現した。中国民衆の間での中国語辞書の啓蒙的役割はかなりの成功を見た。